

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宋代茶具与饮茶习俗

黄晓枫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四川地区从西周时期已开始栽培茶树,到唐代,这里的茶叶生产发展得相当成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宋代的成都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经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与茶事有关的遗物,宋代的成都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茶文化,并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

关键词: 成都平原; 出土茶具; 饮茶习俗; 茶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7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2)02-0042-08

成都平原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的《僮约》,根据王褒的记载,当时在岷江畔的武阳(今彭山)不仅有专门种植茶树的人户,而且在这里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茶叶市场。^[1]有学者认为,四川地区的茶树栽培从西周时即已在三峡地区展开,到唐代,四川的茶叶生产发展得很快,陆羽在著名的《茶经》中记述了8个分布在剑南道北部的产茶区,分别位于彭州、绵州、眉州、邛州、雅州、泸州、蜀州和汉州,彭、蜀、邛三州均在成都平原西部的近山地带,雅州、眉州和汉州则分布在成都平原的周边。在陆羽的记述中表现出了他对蜀地茶叶明显的偏好,雅州的蒙顶茶便被他列为茶中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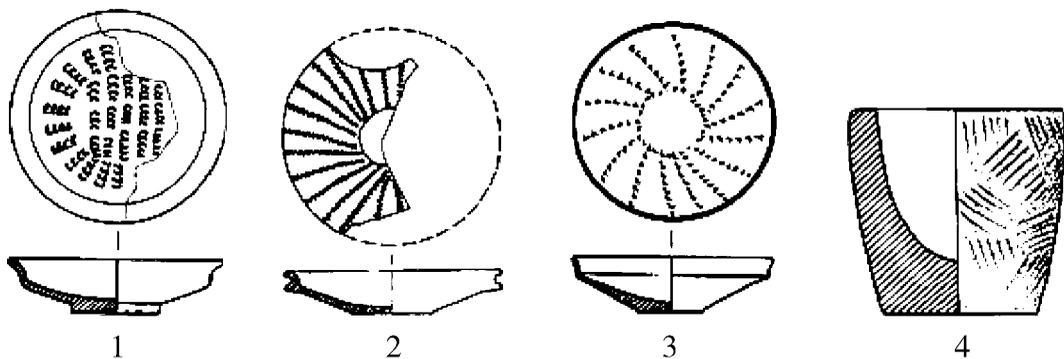
宋代的成都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由于其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入宋以后的成都已经从唐时的“南京”发展成为名动全国的“西南大都会”。与茶相关的种茶、采茶、焙茶、制茶、贩茶、饮茶、斗茶等诸多茶事都普遍地发生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各地。伴随着宋代成都城市文化的发展,饮茶之事在都会城市中已经从百姓的生产、生活诸事中演化出了较为独特的茶文化,并在宋代文人刻意追逐意蕴的烹煮与饮用方式、环境、器具中,形成了饮茶时尚与习俗。

一 作茶与煎茶、点茶

由于宋代的茶叶主要是发酵茶,所以在煎茶与点茶之前,首先要将茶饼研磨成细细的茶叶末,称为“作茶”。“作茶”使用的工具主要为磨、臼和研钵。磨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中所见寥寥,但在刘松年《撵茶图》中有很清晰的图像(图一)。研钵却是成都平原城市、城镇遗址中最常见的出土器物之一,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遗址、^[2]内姜街遗址,^[3]邛崃南街遗址、^[4]平乐冶铁遗址^[5]的宋代地层中都有瓷研钵出土。成都平原各宋代遗址中出土的研钵形体都不大,作碗盏类的造型(图二:1~3),在考古报告中也被称为研磨器。本地出土的研钵一般为酱釉瓷器,外壁口沿下施釉,内壁无釉,以小棍之类的器具戳出成排的小孔,在成都平原的各青瓷、黑瓷窑场上



图一 (宋)刘松年《撵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 成都平原城市、城镇遗址出土的瓷研钵及石臼

1. 杜甫草堂遗址出土青瓷研钵 (T7③:31) 2. 平乐冶铁遗址出土褐釉瓷研钵 (T2④:4) 3. 邛崃南街遗址出土青瓷研钵 (H1:159) 4. 杜甫草堂遗址出土石臼 (H30:3)

都能发现此类器物的生产。此外，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遗址五代到北宋遗迹的灰坑中 (H30) 中还曾出土了一个石臼 (图二:4)，石臼可能不止用于作茶，但结合杜甫草堂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茶具的现象，其作为作茶工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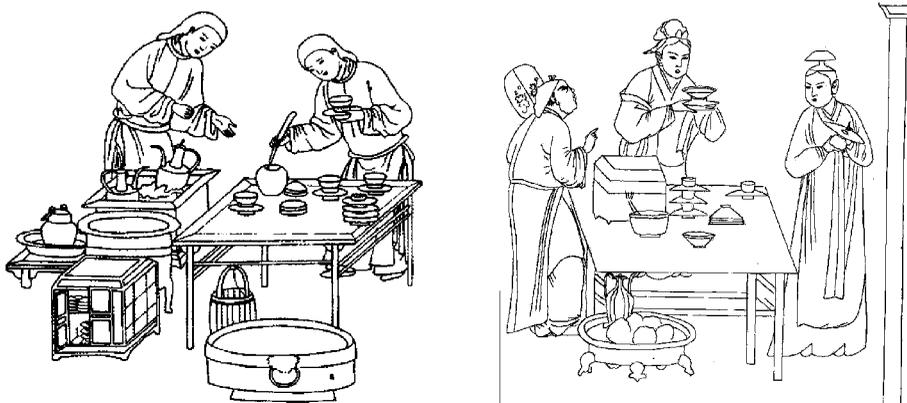
图三 《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煎茶场景摹本 (源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作茶”完毕以后，有用不同的方法制作茶汤。在宋代，制作茶汤的方式以煎茶和点茶最为流行。

煎茶的要领是将茶叶在器皿中以水煎煮，根据陆羽《茶经》中的记载，煎茶从唐代开始即已盛行。《萧翼赚兰亭图》^[6] 中的煎茶场景是唐宋煎茶最生动的写

照 (图三)，茶叶末磨制好以后，煎茶之法就需将茶叶进行煎煮，风炉和铫子是重要的煎煮器具。风炉中最便于携带者为铜铁质，其形体不大，造型也多种多样，以蕴含古意的鼎形最佳。^[7] 而在宋代，风炉也可为砖石垒砌，苏轼《试院煎茶》中有“砖炉石铫形相随”之诵，马廷鸾《谢龙山惠拄杖并求石铫四首》中也有“砖炉石铫竹方床，何必银瓶为泻汤”的诗句，不过品味两人的诗意，砖炉、石铫与竹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和应煎茶的古法，是对古朴、风雅之趣的追求。

点茶是宋代另一种最流行饮茶方式，与被视作“古法”的煎茶相较，点茶在宋代算得上是饮茶中的时尚。北宋时期有不少关于点茶的记载，蔡襄《茶录》、徽宗《大观茶论》等茶书中记载的饮茶方法都是点茶，最直接的图像资料有《文会图》和张世卿墓的壁画 (图四:1、2)。点茶与煎茶最大的不同是茶叶磨成细末之后无需煎煮，而是将茶末调制成膏状置茶盏中，用沸水冲



图四 点茶场景

1. 《文会图》中点茶场景摹本 (采自扬之水《两宋之煎茶》) 2. 备茶图 (张世卿墓后室西南壁)

点，而点茶的高潮就在这“冲点”之上：点茶者以观看沸水冲点之后的茶汤纹路、茶花咬盏的形态等为最大的乐趣。由于茶汤烹制的方式不同，点茶的器具与煎茶器具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作为煎煮之用的铫子与风炉被长流的汤瓶与方形或圆形的燎炉取代。

仿效前人的古法煎茶与风行一时的时尚点茶往往被用在不同的场合。由于宋代的士人饮茶更注重意境，因此蕴含古意的煎茶在文人墨客中更为风行，宋代的煎茶也多用在人数不多的老友小聚场合。宋代蜀中文人对古法煎茶可谓情有独钟，在他们的诗词中也多有描述。苏轼在《试院煎茶》中称道了蜀地煎茶的雅趣与高妙^[8]，从初沸的茶水、蒙顶茶煎煮的形态到煎茶和饮茶的器具，都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而苏辙《和子瞻煎茶》诗则说“煎茶旧法出西蜀。”^[9]曾经入蜀数年的陆游还在返乡后写下《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碓破旗枪。正须山石龙头鼎，一试风炉蟹眼汤。岩电已能开倦眼，春雷不许殷枯肠。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在士人风气的影响下，作为饮茶古法的煎茶在宋代的四川盆地流行甚广，而据文献记载，宋代西蜀煎茶常在茶汤中佐以姜盐等调味，煎出的茶汤口味与其它地方的有所不同，从而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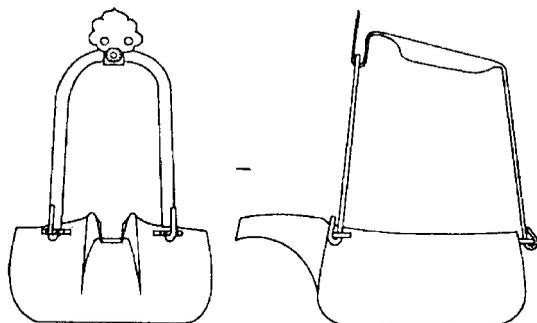
点茶还被称作“分茶”，“斗茶”也是由此产生并在北宋风靡一时。作为两宋饮茶新时尚的点茶，在宋代更多地用在人多的聚会中。在点茶时，对茶汤纹路、茶花咬盏形态的比斗，使得“斗茶”迅速风行。从点茶中发展起来的斗茶流行于北宋初，而风靡于徽宗时期，迨至宋室南渡，斗茶之风渐歇，但斗茶的一些习俗却留在了人们的生活之中，范成大在《题张氏新亭》中说“烦将炼火炊香饭，更引长泉煮斗茶”，讲的就是南宋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尚留斗茶之习；赵孟頫的《斗茶图》也是宋元时期人们在街巷瓦肆中斗茶、饮茶的场景描绘。

二 成都平原考古出土的茶具

煎茶与点茶在茶汤的方法上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茶具。风炉、燎炉极少在考古遗址中出土，最大的原因或源自其质地多为铜铁而易于锈蚀，而瓷质的煎茶茶具的铫子和点茶茶具的长流汤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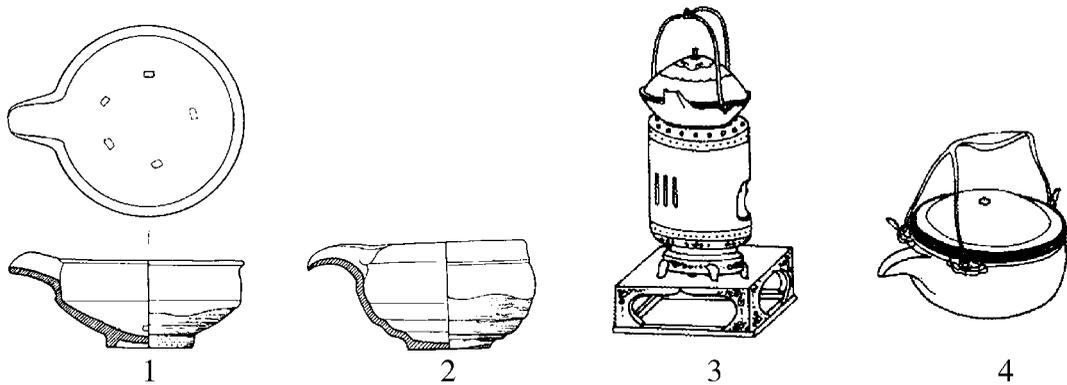
在成都平原的城市考古中则极为常见，铜、银质地的铫子、长流汤瓶在保存条件更好的窖藏等遗迹中也有出土。

铫子为碗钵形的带流器具，形态上大致可分为有柄和无柄的两种，材质上则有瓷、铜、银、石等不同的种类。这种器皿在考古出土器物中通常被称为“匱”，被作为一种取水器皿，在实际的使用中它却并不只用于取水，更常被作为煎茶的器具。从出土数量上统计，四川盆地出土的铫子大多为瓷质，有少量铜质和银质器皿。瓷质的铫子见于各个生活遗址和瓷器生产窑址，铜质、银质的铫子则见于各地窖藏中。总体而言，铜质和银质铫子数量并不多，无柄的铜质铫子见于阆中丝绸厂窖藏^[10]和江油彭明公社窖藏^[11]中，银质铫子仅见于德阳孝泉清真寺窖藏^[12]，它们的造型相似，并都套有细高的提梁（图五）。有柄的铜质铫子则仅见于广安大良乡窖藏，原报告称为“鏊斗”。^[13]



图五 江油彭明公社出土铜质无柄铫子

成都平原上的瓷质铫子可见于宋代各个青瓷窑场的生产，邛窑什邡堂窑址、都江堰玉堂窑址等都有出土，又以玉堂窑的青瓷铫子数量最大，在2007年的调查与试掘中，调查采集的青瓷铫子标本4件（含残件）、乳浊青瓷标本2件（残件）；^[14]六号窑包试掘出土的青瓷铫子1件、乳浊青瓷铫子95件（含残件）、酱釉铫子5件^[15]，十七号窑包出土白瓷铫子16件、乳浊青瓷铫子11件。^[16]其中白瓷铫子为无柄的造型（图六：1），与定窑白瓷铫子较为接近（图六：4），其使用状况也当与刘松年《撵茶图》中的铫子相同（图六：3）。成都内姜街遗址的宋代地层中也有无柄铫子出土，为琉璃厂窑黑褐釉产品（图六：2），杜甫草堂遗址则有无柄青瓷铫子和酱釉铫子出土，^[17]为邛窑系的瓷器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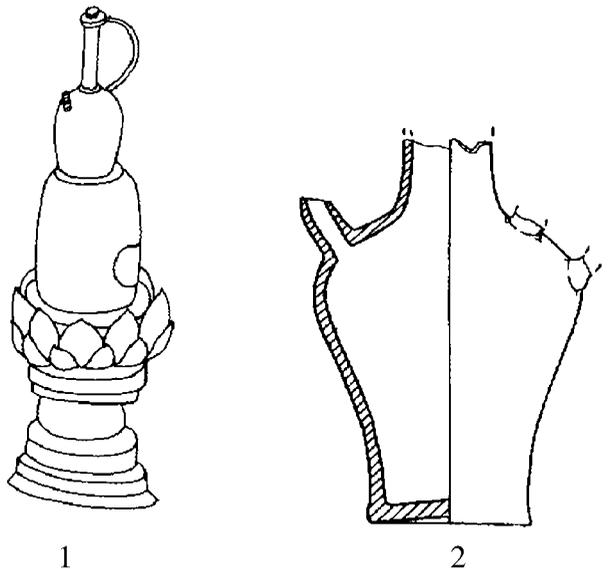
图六 无柄瓷质铫子及其使用

1. 玉堂窑白瓷铫子 (Y17T1⑤:1) 2. 内姜街出土黑褐釉铫子 (T4 扩⑦:3) 3. 风炉和铫子摹本 (采自扬之水《两宋之煎茶》, 源自刘松年《撵茶图》) 4. 定窑铫子 (采自扬之水《两宋之煎茶》, 源自定窑出土器物)

在成都平原西缘的玉堂窑产品中,有柄的铫子产量在本地窑场的生产显然比无柄铫子更多,玉堂窑2007年调查与试掘出土的铫子标本共134件,其中有柄铫子共123件,以乳浊青釉瓷器为大宗,它们的柄都较短,呈长圆形,表面有螺旋纹便于捉握(图七:2)。柄与铫子连接处较细,加之玉堂窑的铫子器形较大,且胎壁厚重,器物沉重的胎体导致了柄部较容易断裂,因此在窑址试掘中未发现一件完整带柄的铫子(图七:1、3),却有大量残断的柄出土(图七:2)。与玉堂窑的铫子相似的有出土在邛崃南街遗址的带柄铫子,为邛窑什邡堂窑的酱釉瓷器产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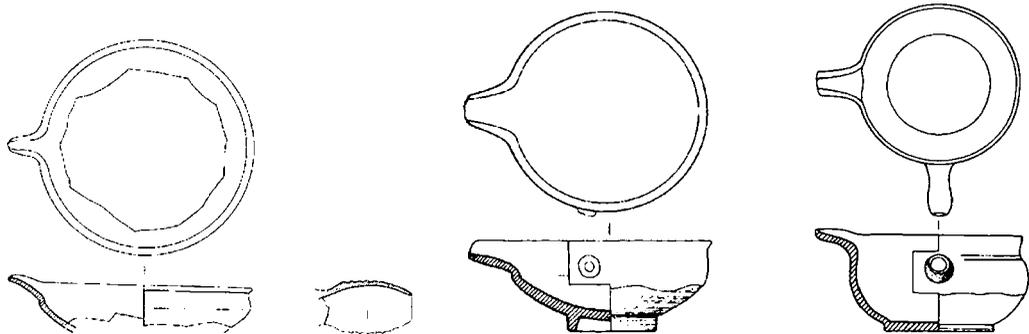
宣化下八里张匡正墓壁画中的场景^[19]显示,煎茶中有时还用煎茶瓶替代铫子(图八:1)。煎茶瓶为短流注壶,从两宋成都平原遗址、窑址出土的注壶形制观察,本地生产和使用注壶基本上都是长曲流的注壶,仅在杜甫草堂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短直流的青瓷长颈注壶残件(图八:2),^[20]在别的遗址中则很少见到同类的器物,说明这种

使用煎茶瓶的煎茶法在本地并不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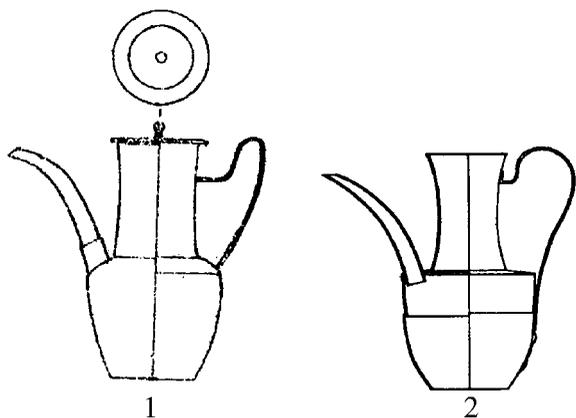
图八 煎茶瓶的使用

1. 煎茶瓶及风炉摹本 (采自扬之水《两宋之煎茶》,源自宣化下八里张匡正墓壁画) 2. 杜甫草堂出土煎茶瓶 (T6③: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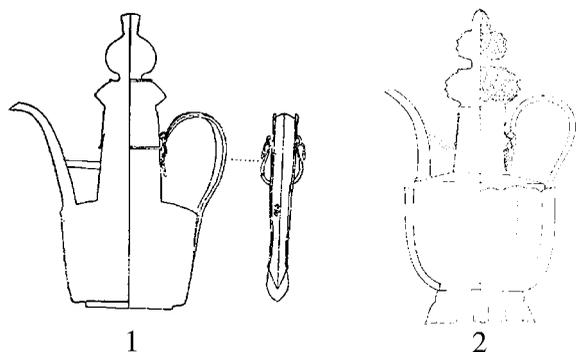
图七 玉堂窑、邛崃南街遗址出土的本地有柄瓷铫子

1. 玉堂窑乳浊绿釉铫子 (Y6:33) 2. 玉堂窑出土乳浊绿釉铫子的柄 (Y6:1) 3. 玉堂窑乳浊绿釉铫子 (T1 扩③:38) 4. 邛崃南街遗址酱釉铫子 (T1③:168)



图九 铜质汤瓶

1. 成都簇桥窖藏出土 2. 江油彰明公社窖藏出土



图一〇 银质汤瓶（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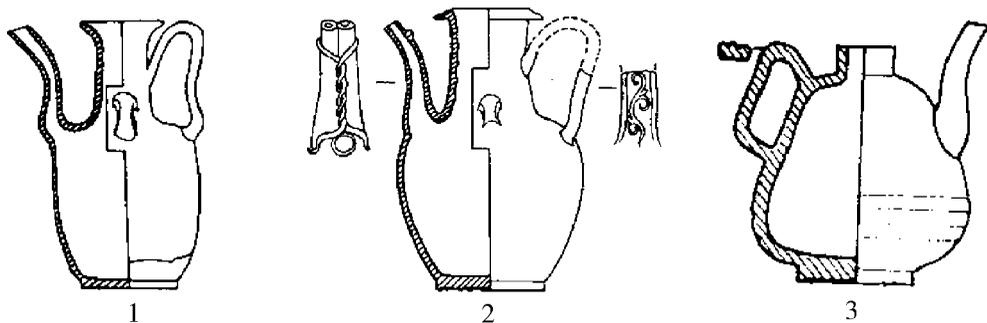
1. 德阳孝泉清真寺出土银执壶 2. 彭州西大街窖藏出土银执壶与温碗（CPJ:228、219）

在点茶中，为了保证热汤冲击茶盏中的茶叶末膏形成乳花，点茶的汤瓶不能用短流的煎茶瓶，而必须用长流的汤瓶，这种器皿在考古发现中常被称为长曲流的执壶或注壶，是最常见的两宋器皿之一。在成都平原的两宋考古资料中，铜质、银质的长流汤瓶多见于各地窖藏中，瓷质汤瓶则在遗址、窖藏、窑址上都能见到。铜质的长

流汤瓶是最适宜点茶的器具之一，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窖藏中大量出土，发现了这种长流铜汤瓶的窖藏有成都南郊簇桥窖藏、^[21]温江县委窖藏、^[22]彭州工业大道窖藏、^[23]简阳东溪园艺场窖藏、^[24]彭山罐头厂窖藏、^[25]大邑安仁镇窖藏、^[26]江油彰明公社窖藏、^[27]江油河西乡窖藏、^[28]出土的铜汤瓶基本都呈长颈、长曲流的造型，长曲流细长，不少铜汤瓶还带盖，与点茶场景中的铜汤瓶形态一致（图九：1、2）。银质长流汤瓶相对而言数量较少，见于德阳孝泉清真寺窖藏（图一〇：1）^[29]和彭州西大街窖藏（图一〇：2），^[30]其中彭州出土的银质执壶共九套，分为折肩执壶和溜肩执壶两类，均有温碗配套，其中折肩银质执壶与前述铜质汤瓶形态相近，但在瓶盖上以繁缛的莲花纹装饰，竭尽奢华之美。这种华美的风格与点茶的时尚相互呼应，与煎茶的“石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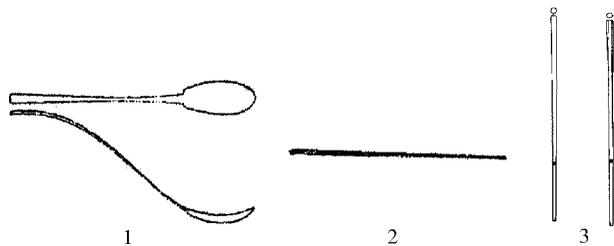
在铜汤瓶大量流行的同时，瓷质的长曲流汤瓶也非常丰富，成都平原的窑场中均可见青瓷长流注壶的生产，最典型的是邛窑什邡堂窑场的长曲流注壶的生产。邛窑什邡堂窑生产的长曲流注壶的形态非常丰富，颈部的长短、粗细，腹部的大小、高矮等变化都很多，还存在有系与无系之别（图一一），有系注壶一般都在颈肩部附设双系（图一一：1），以其作为茶具中汤瓶的可能性最大，考双系出现的原因，当为盛装热汤的壶体附设绳索等提梁之用。什邡堂窑的注壶中最为独特的是双流注壶的造型，流部为两根大小相同、并列的长曲流（图一一：2），在窑场上大量生产。

在茶汤制备过程中，匙与箸是重要的配套器具，铜质的匙与箸则常见于成都平原及周边各地



图一一 成都平原邛窑生产的各类点茶汤瓶

1. 邛崃南街遗址出土长曲流双系注壶（H1:159） 2. 邛崃南街遗址出土长曲流双流双系注壶（H1:165） 3. 邛窑什邡堂窑遗址出土长曲流注壶（86QS5YT41③:8）



图一二 铜匙与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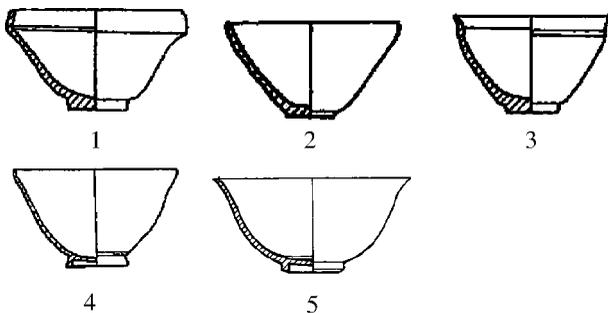
1. 成都簇桥窖藏出土铜匙 2. 成都簇桥窖藏出土铜箸 3. 峨眉山市罗目镇窖藏出土铜箸

的窖藏中，在剑阁白龙乡和卧龙山窖藏、^[31] 阆中丝绸厂窖藏、^[32] 成都南郊簇桥窖藏、^[33] 德阳景福公社窖藏、^[34] 温江县委窖藏、^[35] 大邑安仁镇窖藏、^[36] 峨眉山市罗目镇天久电冶公司二号窖藏、^[37] 江油县窖藏^[38] 等都有匙与箸的出土。这些铜质匙与箸尽管不是煎茶、点茶的专用工具，但在备茶之时却是必备之器（图一二）。

茶汤调制停当之后为饮茶，盛茶汤的茶盏以及与盏配合使用的盏托则在必备。《撵茶图》、《萧翼赚兰亭图》、《文会图》等画稿中用以摆放茶盏的桌、案为竹木质地，在考古发现中很难见到，而其余配套的盆、碟、带盖小罐等。盆、碟、带盖小罐多为瓷质器皿，常见于各处，其中盆以本地青瓷产品为主，碟与小罐则青瓷、黑瓷与白瓷皆有，不一而足。

尽管由于点茶与煎茶手法不同，各个环节的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茶盏的使用却是它们所共有的。与其它的茶具相似，茶盏也有瓷质、铜质以及金银质地的不同种类，但以瓷质茶盏最多，并在两宋时期大为流行。四川盆地出土的瓷质茶盏有黑瓷、白瓷、青瓷和青白瓷等各色，点茶中为观察茶花，常用黑瓷的茶盏，作为比试点茶技巧的斗茶中更是如此。茶盏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建窑黑瓷产品，由于建盏胎体厚实，釉色华丽，成为北宋皇室点茶与斗茶的供御之物，黑釉茶盏的生产在宋代也随之风行。四川盆地从北宋早中期开始，迅速涌现出来大量黑瓷生产窑场，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成都平原边缘的龙门山脉浅丘地带的金凤窑、瓦缸坝窑，成都平原南部的西坝窑、坛罐窑，川东平行岭谷地带的涂山小湾窑、酱园窑、荣昌窑、清溪窑，以及川北山地的广元窑等。小底足的黑瓷茶盏成为这些窑场的主导产品，大量出现于北宋中晚期，一直流行至南宋晚期。黑瓷茶盏釉面多为结晶釉的装饰，常见黑

色、黑褐色、酱褐色、褐色、酱红色、赭黄色、酱绿色等不同的釉色，大多釉面光洁明亮，金凤窑等窑场的产品还具有黑釉泛蓝的釉色特征。常见的花纹有兔毫、红褐色的斑纹、鹧鸪斑纹等，也有油滴、玳瑁等纹样，花纹变化丰富，纹样不一而足。在南宋中期以后，金凤窑还出现了绿褐色、茶褐色等釉色的短暂流行。宋代四川盆地各地黑瓷茶盏的胎体一般不太厚重，多夹杂石英颗粒，由于胎土原料的不同，各地的胎色差异也比较大，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主要有紫红色、深灰色、灰黑色、白色等不同胎色，而川东平行岭谷地带的涂山窑则主要为灰白色，其次为黄胎、红褐色胎及灰胎；广元窑黑釉瓷器胎体坚硬，胎骨较为粗糙，胎体多显得厚重，胎色以浅黄色、灰白色为主，另有灰黑色、红褐色等。深入分析四川盆地各个窑场的生产因素可以发现，本地的黑瓷产品生产其实是受到了北方地区马蹄窑技术的时刻影响。但是，建窑黑瓷茶盏作为一种时尚因素在全国的迅速推广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容小视的，从外观上四川盆地的本土黑瓷茶盏产品与建窑的黑瓷盏差别也较为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地黑瓷茶盏的生产与使用受到了建窑黑瓷茶盏的间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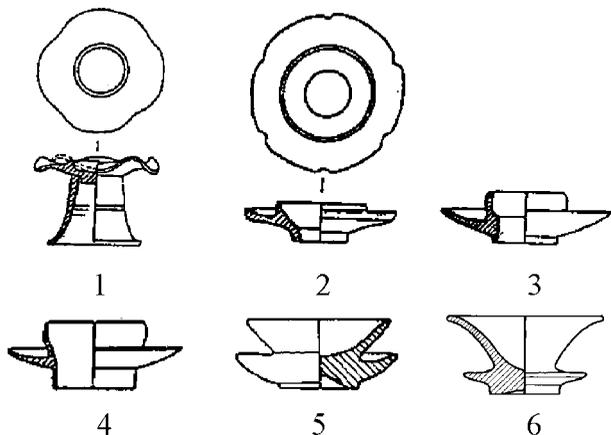
图一三 成都平原窑场出土的各类茶盏

1. 金凤窑黑瓷茶盏 (T3②:82) 2. 瓦缸坝窑黑瓷茶盏 (T1001③:10) 3. 瓦缸坝窑黑瓷茶盏 (T1010②:3) 4. 什邡堂窑乳浊青瓷茶盏 (84QS5YT②:18) 5. 磁峰窑白瓷茶盏 (AT33③:72)

四川盆地的茶盏生产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黑瓷产品中，不过，成都平原的磁峰窑和什邡堂窑却在南宋时期分别有过白瓷茶盏和青瓷茶盏的生产，其造型都为侈口斜弧腹小圈足的造型，什邡堂窑的青瓷茶盏为乳浊青瓷，是南宋时该窑场最美观的蓝绿色乳浊釉。从宋代的各类记载中可知，点茶、以及点茶所衍生的斗茶中黑瓷茶盏是

最佳的茶具，白瓷与青瓷的茶盏在茶事中并不被视作佳器，这些白瓷茶盏和乳浊青瓷茶盏的出现实则是饮茶时尚对瓷器生产所形成影响力在各地窑场衍化以后的一种体现（图一三）。

四川本地瓷器的产品中还有与茶盏配套的盖托，盖托的造型各异，成都平原的黑瓷窑场有不少旨在模仿金属器皿的造型与颜色（图一四：1、2），其中金凤窑 T24 标本与彭州西大街窖藏出土的银质茶托较为接近。在四川盆地普遍流行的是圆口、直口的通底盖托（图一四：3、4），这种造型的盖托在盆地各地的黑瓷窑场都能见到，而喇叭口的凹底盖托（图一四：5、6）则在峡江地区和盆地北部山地更为流行。



图一五 四川盆地宋代窑场出土的各类盖托

1. 金凤窑出土酱釉盖托（T48③:107）
2. 金凤窑出土酱釉盖托（T24②:142）
3. 瓦缸坝窑出土黑瓷盖托（T2002③:34）
4. 涂山小湾出土黑瓷盖托
5. 广元窑出土黑瓷盖托（T7③:62）
6. 涂山窑出土黑瓷盖托（1982NH 采集:501）

在彭州西大街窖藏还出土银质茶托 23 件、斗笠银碗 7 件、各式银杯 56 件，相较瓷质茶盏、盖托，这些器皿或许不是专用的饮茶器皿，但也不排除作为茶具的可能。

三 宋代成都平原的茶叶消费与茶马贸易

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天禧年间，成都每年的三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最大宗。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39]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优质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40]“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颖，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41]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入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

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42]外地的茶叶也输入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43]彭州棚口茶场一天便有 6 万斤的茶叶入库记录，巨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1059 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44]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 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

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羈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45]交子与钱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极具优势的流通货币。

注释:

[1] 王褒在《僮约》中为一户主仆订立了一份契约,规定奴仆必须从事的劳役包括了“脍鱼炮鳖,烹茶茶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明确记载了当时民间的种茶、买茶和饮茶之事。见(清)严可均辑,任雪芳审订《全汉文》卷四二,第4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唐一宋遗址发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209~26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内姜街遗址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364~39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邛崃市南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0》,第324~34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邛崃市平乐镇冶铁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365~38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6] 《萧翼赚兰亭图》旧题为唐阎立本所绘,但现在有研究者认为此画出自宋人之手。目前该画作有两个版本,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本文中采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的摹本。

[7] 陆羽《茶经·四之器》:“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宋平生等著译《历代茶经酒经论选译》,第2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8] 苏轼《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飏飏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日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逐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盏捧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形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9] 苏辙《和子瞻煎茶》:“年来病懒百不堪,未废饮食求芳甘。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尤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

又不见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我今倦游思故乡,不学南方与北方。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何时茅檐归去炙背读文字,遣儿折取枯竹女煎汤。”

[10] 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图二〇,《文物》1984年第7期。

[11] 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12] 沈仲常《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图版九:7,《文物》1961年第11期。

[13] 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瓷器》,图十,《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江堰市文物局《2007年玉堂窑遗址六号窑包试掘调查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7》,第336~337、348~349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1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江堰市文物局《2007年玉堂窑遗址六号窑包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7》,第435、400~401、415~417页。

[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江堰市文物局《2007年四川都江堰玉堂窑17号窑包试掘简报》,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第431~432、447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1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杜甫草堂唐一宋遗址发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237~238页。

[1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邛崃市南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0》,第331~332页。

[1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图版一,文物出版社,2001年。

[2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杜甫草堂唐一宋遗址发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235~236页。

[21] 翁善良《成都南郊发现宋代窖藏铜器》,图二,5,《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22] 温江文化馆《四川温江发现南宋窖藏》,图二,1,《考古》1977年第4期。

[2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392~432页、图六:3。报告中描述为残件。

[2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图五四,《文物》1987年第2期。该报告认为这是一座元代墓葬,但笔者认为它是一座利用了旧有墓穴的窖藏,将另文详论。

[25] 帅希彭、方明《彭山发现南宋窖藏》,图一,《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该报告中的两个窖藏中都有长流的铜汤瓶。

[26] 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图一二,《文物》1984年第7期。

[27] 江油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图一,9,《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下转第89页)

的形象,表达喜庆和祝福之意;它融合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反映人们积极健康向上的情感,渗透着我国民族传统和民间习俗,在民间广泛流传,为人们喜闻乐见。

“物必饰图,图必有意,意必吉祥”。^[6]吉祥图像从先民探物取象,远取诸天近取诸身,主观的伦理道德、典章制度、阴阳思想的影响,有其沿袭规制的思维模式,在客观上成为百姓不约而同的理念,形成约定俗成沿袭旧例依样画葫芦的传承方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明清时期吉祥图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已渗入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吉祥图案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和一些吉祥文字,以民间谚语、吉语及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赋予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愿望。它因物喻义、物吉图案,将情景物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趣味盎然,富有独特的格调和浓烈的民族色彩。

尽管蝙蝠历来给人们的印象很丑陋、很可怕,但因蝙蝠与“遍福”、“遍富”谐音,故被视为幸福吉祥的象征,寓意“福”、“富”,被人们充分美化作为象征“福”的吉祥图案。南粤地区的传统建筑陈家祠、余荫山房、宝墨园的建筑物、文物上的蝙蝠装饰图案,具有深刻的寓意,充分体现了浓烈的蝙蝠文化,这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精彩的一个篇章。

注释:

[1] 吴毅等 《广州市区翼手类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 李新华 《岭南传统建筑装饰雕塑艺术的美学特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 刘晓荣等 《余荫山房装饰艺术研究》,《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

[4] 王海娜 《广东佛山东华里古建筑群保护与利用初探》,《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5] 陈益宗 《东方图像榜·蝴蝶蝙蝠》,第97~99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6] 陈益宗 《东方图像榜·蝴蝶蝙蝠》,第202页。

(责任编辑:赵宏亮)

(上接第49页)

[28] 曾昌林 《江油发现宋代窖藏》,图二,《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

[29] 沈仲常 《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图二、图版九:9,《文物》1961年第11期。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 《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第94~124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1] 母学勇 《剑阁宋代窖藏综述》,图九,《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32] 张启明 《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图二一,《文物》1984年7期。

[33] 翁善良 《成都南郊发现宋代窖藏铜器》,图一、2、3,《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3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德阳县文物管理所 《四川德阳县发现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

[35] 同 [22]。

[36] 大邑县文化馆 《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

[3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峨眉山市文物管理所 《峨眉山市罗目镇宋代窖藏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38] 同 [22]。

[39] (宋)范镇著,汝沛点校 《东斋纪事》卷四,第37页,中华书局,1980年。

[40] (宋)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七三《剑南西道二·彭州》,第1485页,中华书局,2007年。

[41] (宋)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七三《剑南西道四·蜀州》,第1528页。

[42] (宋)文同 《谢人寄蒙顶茶》:“蜀上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灵根托高顶,胜地发先春。几树惊初暖,群篮竞摘新。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的砾香琼碎,蓬松绿逗匀。漫烘防炽炭,重碾敌轻尘。惠锡泉来蜀,乾峰盏自秦。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沃睡迷无鬼,清吟健有社。冰霜凝入骨,羽翼要腾身。落落真贤宰,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涩,莫厌寄来频。”

[43] (宋)吕陶 《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净德集》卷一,第4页,中华书局,1985年。

[44]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第4478页,中华书局,1977年。

[45]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三七四“元祐元年三月癸丑”条,中华书局,1995年。

(责任编辑:曾德仁)